



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

XINFANGFALUN YU WENXUETANSUO

明信

新方法论 与文学探索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
选 编



TANSUO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选编
《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唐维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68,000 印张：17.25 印数：1—3,400

统一书号：10456·10 定价：2.45元

新书目：85—14

目 录

序 徐中玉 (1)

第一辑 综合研究与新方法论

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

 动态 刘再复 (9)

 论知性的分析方法 王元化 (50)

 综合：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途径 吴亮 (59)

 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

 方法问题 王蒙 (69)

 “测不准原理”与现代派文学的

 欣赏 吴竹筠 夏中义 (88)

 论阿Q性格系统 林兴宅 (101)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 朱光潜 (128)

 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 季红真 (141)

 形式美与形式主义 张本楠 (159)

 艺术思维的三种结构类型 成立 (177)

 个性之谜与人物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

——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哲学

 依据 刘再复 (192)

第二辑 文学研究与心理学

两级心理对位效应和文学的人性深度

- 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心理依据的探讨 刘再复 (235)
人物意识流动的深层次结构 张德林 (276)
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 鲁枢元 (292)

第三辑 文学创作中的时空观

艺术家对时间的雕塑

- 谈诸种艺术对时间的处理 宋耀良 (312)
小说创作时空观谈片 张德林 (322)
小说的时间观念 金健人 (333)

第四辑 象征、变形、怪诞艺术规律探索

- △ 象征：小说艺术的诗化倾向 周政保 (354)
“变形”艺术规律探索 张德林 (365)
论怪诞 姚一苇 (380)

第五辑 文学观念的演变与艺术魅力的鉴赏

- 创作论从政治性到认识性到审美性的
发展 周介入 (408)
艺术的魅力
——在一个会上的发言 钱谷融 (436)
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艺术思考
——兼评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种倾向 徐芳 (460)

第六辑 现代派文学与现代西方文论略览

-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 袁可嘉 (481)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关于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现代西方
文论略览 张隆溪 (506)
谁能告诉我：我是谁?
——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 张隆溪 (520)
作品本体的崇拜
——论英美新批评 张隆溪 (532)
后 记 (543)

序

徐中玉

庄子说过这样的话：“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踰而后善搏也。”人走路时实际有用的不过是尺把宽的路面，但如两边是深渊，人就不敢迈步了。快步走路的人需要心理上的一种安全感，觉得快走中摔几跤都没有关系。庄子这几句话可借来说明学术自由对一切研究工作者都是多么重要。

当前，文艺理论研究正面临令人鼓舞和乐观的前景，正处于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在文艺领域里不甚受到重视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现已开始占有令人瞩目的位置。已经出版和即将涌现的批评性刊物将多达十几种，这个数量在文艺史上是空前的。加上各类有关的丛书，可说目前我国已掀起了一股“文艺理论热”。这种形势对研究工作者形成了一种很大的鼓舞和推动力。长期被禁锢、封闭，常被实用主义地要求从属于政治，从属于阶级斗争，要求为错误政策服务而有了不好名声的文艺理论批评，开始有了复苏和更新。

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和探讨，是当前文艺理论界一股新的潮流，具有变革的意义。如果说，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创新可以推动并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那么，以改革和发展的精神进行方法论的探讨可说是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一个关键。

理论上的创新不仅是材料、框架和研究课题的改革和变

更，更重要的，应该是研究方法和理论本身的更新和拓展。那种把理论上的创新理解为运用固有概念、理论、方法，分析新的文艺现象，以求得出不同的观点，难免仍旧是狭隘片面的，可能得出的仍是没有多大新意的东西；把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理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和理论，以为现在提出方法的改革和多样化一定就会导致背离马克思主义，则更是一种主观推想，未必实事求是，未必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因为，第一，过去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有些理论和方法并不完全真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即使那些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本身也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原来就要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在发展中保持它的生命力，而且一般方法也不能代替具体学科自身需要的方法；第三，自然科学的方法原不尽属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但事实证明其中有些方法对革新社会科学研究也很有用处。因此，问题是在于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革新精神，密切结合客观实际，说明和解决文艺创作与评论中提出的新问题。很多新方法其实并不与马克思主义对立或相反，而是它对专科学术或深层次研究的某些补充发展的表现。每种方法都有它观察研究的独特角度，能起一定的作用。运用多种方法，不同角度来观察研究客观事物，通过比较，往往可以互相补充，把客观事物观察得更全面，更深入，从而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认识，增强我们的辨别力，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建立或在更高层次上完善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系统。

实现方法多样化的一个必要途径是通过“移植”、“交融”和边缘科学的研究，即从社会科学的“左邻右舍”以至自

然科学的某些领域引进方法和观念，使文艺理论与多种学科互相渗透、借鉴，决不能再自满自足，故步自封。这种渗透、借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艺理论不仅应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哲学等学科溶合，不仅应从“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吸取营养，找出相通的因素，借鉴其概念和方法，而且还应该在弄清真相的基础上，大胆吸收改造外国一切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例如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等等的合理因素。运用新方法研究和解决文艺的基础理论问题具有迫切性，一些构成理论基石的基本文艺概念、观点，如反映论、形象性、文艺的特征、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虽已谈了很久很多，但一直由于禁区太多，其实仍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完满解决。“三论”尤其是系统论沟通了哲学与文艺理论，是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溶入而且还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新方法与固有方法以及传统方法应该一道进行深入的、历史的、互相比较的研究，在探讨新方法的同时，也不可排斥原有的方法，如文艺社会学的方法。

方法论问题讨论的收获重在它的实际应用。归根到底，方法是手段，它的活力和价值有待于实践的验证。现在有的同志依据系统理论，从宏观上提出了关于文学理论系统的设想，即以作品论为中心和原点，构筑起文学心理学的横向（包括创作论、鉴赏论）与文学社会学的纵向（包括发展论、方向论）交叉的座标图式，本质论则是包容全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大圆圈。有的同志则从微观着手，采用系统方法，通过具体作品分析典型的多种因素、多种层次，研究鲁迅思想转变的模糊性问题。有的同志则从宏观与微观交叉的视点

上，对文艺区别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内容加以重新阐述，分析了文艺内容的三个系统（客观生活、作家评价、既在客观又在主观的美）及系统内的四个层次（整体的社会生活，活生生的人，人的精神生活，浅层与深层的心理活动）。还有的同志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对许多文艺问题的传统解释提出质疑，认为过去对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形象大于思想等问题的研究是直线因果链思维模式的反映，对意境的阐述则是一种本体论的分析。这些看法和成果尽管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和验证，但对打开我们的思路，活跃思想，加速文艺理论研究新方法的消化以及它与文艺实践的结合方面，无疑都是有益的。

在新方法的实践运用上，有的同志指出目前存在这样一些现象：即有些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分析研究文艺现象和理论问题的文章结合文艺实际不够，显得有点牵强抽象。有的大量搬用可能尚未吃透的新概念新术语，使人读了仍不明白。有的简单地用自然科学中已有的结论加上一点文艺例子，便去证明新方法的正确，融合消化不够。有的用了新方法新理论但并没有得出能够令人信服的新成果。这些同志主张，应该鼓励、支持、探索新的方法，但要看到，关键是在于结果，即运用了新方法之后，还必须力求得出新的有价值的成果，看是否解决了原有的方法不能解决或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做大量的刻苦的努力，而不能只停留在表层的鼓吹和平面的简单介绍上。但许多同志也都指出，这是新方法引入、消化和实践运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现在尚处于新方法引入和运用的准备阶段、初级阶段，它必然会同成熟和发展的阶段迈进。我们可以指出其中的问题和

不足，毕竟应该鼓励、欢迎各种新的尝试、新的探索。

我们对过去已经实践证明是真理、是规律的东西应该坚持，不要因为它不是新东西就加以轻视、厌弃。同时我们对一切新东西，即使它还不很完善，或者在运用上还不甚具体妥贴，也不要根本怀疑、反感，甚至排斥，而是需要仔细加以了解、分析，千万不要深闭固拒，象过去那样，对我们还不知道、不理解、不习惯的东西轻率地断定为异端邪说，而一律加以抛弃。我们过去的研究方法诚然有很多合理的东西，但有些确实太一般、太笼统、太外部、太雷同、太凝固了，对文学上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现象，对文学这一学科自身的很多特殊问题，确实还未能解释得了，解决得好，至少，还很不完善。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对文学内部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多样特殊的，针对某些精细微妙现象（灵感、非理性、潜意识）的，独出心裁具有新意的研究，经常受到怀疑甚至攻击、诬陷，往往被说成是以特殊性否定、取消普遍性，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甚至还会被扣上政治上反动、反革命的吓人帽子。因此对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的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思考与探讨便成为不但得不到鼓励反而要受到打击的苦事，实际上把它变成了一个禁区。这当然很不幸，既严重影响了理论研究的发展，也给繁荣创作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自从大地重光，实行开放政策，提倡解放思想、创作自由、学术自由之后，有关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的外国材料陆续被介绍进来，很多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觉得中间有不少新意，确实得到启发，感到能够帮助我们说明、解决一些我们过去研究中未能或未能比较完整、深入地说明、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它

们触发了我们进行积极思维，进行创造性研究的活力。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最近形成了一种探讨的高潮，无疑，这是一种很自然、很有益的现象，它是对过去闭目塞聪、自满自足的那种盲目自大状态的合乎规律的反拨，反映出我们许多研究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同志们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和要在文艺理论研究上进行新的探索的中华有志之士昂扬、奋进的精神。

在新方法新观念的介绍、探讨和运用中，诚然存在着一些执其一端，见其一隅，照明了某一局部，而还未能足够完善地说明整体的欠缺。但这是新事物，新观点，新方法探索、前进中必经的一个过程。目前，与其急于苛责它的不成熟，不系统，不完整，恐怕更应该欢迎它在除旧布新方面的努力，肯定它在这一点那一点上已经取得的成绩，哪怕它们还是不成熟，不完整，不系统的。我们把新的探索过程中存在的弱点和不足之处尽量提出来，目的在于促进、加强、支持这种新的探索，使它更加具体，切实，完善起来，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前进，对繁荣创作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恢复理论研究对从事创作同志们的信任，进而使他们真的感到学习、关心理论研究的成果，确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在新方法的介绍、研究、运用中，我们现在确实希望能够再提高一步，总的说，就是希望介绍得更系统些，研究得更细致些，运用得能更切合文学创造和理论研究的实际。把自然科学中的方法运用到文艺学的研究中来，要考虑到文艺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无论是方法，甚至名词、概念、范畴，都宜于参考、借鉴、渗透，而不宜生搬硬套。有些研究文艺问题和讨论作品的文章写得过于艰涩，名词术语用得太

多，令不少读者感到头痛，希望有所改进。是否写得亲切，平易，具体，生动一些就无法把那些道理讲清楚？恐怕不是这样。文艺研究论文就要象文艺研究论文，不要变成纯粹思辨的哲学，或者象排列许多数字公式的自然科学论文那样，而必须要有可读性，有理有情，使读者得到明确的知识，受到有力的感染，这才能把有价值有生命力的理论真正交给群众。对某种方法的研究，在一篇论文里当然要有所侧重，而且力求深入，但也应该考虑到各种方法难免都有一定的局限，而且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说明总体的问题，因此心里要先有一个全局观点。一般的方法恐怕都不可能说明、解决总体各个层次、各个侧面、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一切问题。专、精是一个要求，综合是一个要求，不能偏废，需要力求结合、统一，既能使读者耳目一新，又能使读者觉得真正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归根到底，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艺事业，我们的文艺学研究，都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就不能有进步、有迅速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大胆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有益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要共同努力来弥补探索中的弱点和不足，使新的探索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理论研究和繁荣创作两方面都产生出丰硕的成果。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担负起改革的历史使命。相信我们大家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今后，如何开创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局面？我认为：第一，应该坚决贯彻学术自由的方针。创作必须是自由的，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研究也必须是自由的。在大方向的指导下，应该容许各种观点自由讨论，在充分讨论中明辨是非，认

识真理。只有这样，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才能分辨得清楚。第二，必须坚持解放思想，清除“左”的影响，改变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不断的探索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第三，目前打开文艺理论研究新局面的主要任务是开拓，是提倡多样化。要相信群众有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正确的会长存下来，错误的会被淘汰。要充分肯定有闯劲、敢革新、能创造、有理论勇气的人，要进一步发扬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

本书的编选，对推动新时期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发展，对探索新方法、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相信都能起些有益的作用。窗口打开了，空气互相流通，信息得以交换，就能使我们的工作增加活力，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保持清新，常有生气。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应该入选的佳作这次难免有所遗漏，我们将继续努力，把这一推荐、介绍工作，做得更及时、更丰富。

一九八五年六月

第一辑 综合研究与新方法论

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

刘再复

我的这篇文章，谈的是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新出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展动态，主要是从方法论发展趋向的角度来谈，也涉及到一些文学观念的变迁。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近年来我国的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尤其在方法论方面有了更显著的进展。这种进展的事实，已逼使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了解。即使决心一辈子坚持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人，也不能不注意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并对已有的观念和方法作某种程度的反省和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

新的方法论的介绍和运用，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文学自身各方面的本质特征，更深刻地揭示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以促进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繁荣。方法论本身并不

是目的，但是，新的方法论，新的审视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接近真理，改变某些不正确的文学观念，踏进更多未知的领域。对方法论的兴趣，是一种接近真理的热情表现。只有对文学研究事业抱着真诚的热忱，才有责任感去熟悉新的方法论，而不会满足于已知的东西。爱因斯坦曾说：“只要存在着这些（理论）目标，科学方法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科学方法本身不会引我们到那里去的。要是没有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科学方法。”（《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查》，《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94页）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但是，应当承认，这个领域现在比解放后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气，而最明显的特点是在研究工作中，积极性的思维方式已占主导地位，并正在进一步地代替消极性思维。所谓积极性思维，包括三个含意：（一）文学研究的方式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二）即使是带批判性的文章，也注意正面的理论建树。（三）文风上是科学的、积极的，出发点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业的。总之，不是破字当头，而是“建设”当头。

过去我国的思想领域里，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积极性思维的命运极坏。凡是正面建树的东西，几乎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遭到批判，被扣上各种帽子。而从事粗暴的、简单化的、非科学的批判，却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极坏的文化性格，这种性格就是拒绝艰苦的精神劳动，蔑视积极性思维，而走一种破字当头的捷径，拿着几个现成的公式和教条，去寻找积极性思维成果

中的某些隙缝，然后给予整体性的爆破。这种“爆破手”，不是用脑子生活，而是用鼻子生活，即靠鼻子感知政治气候而生活。这种极坏的文化性格是“左”倾文化政策的产物，它几乎要造成我国文艺科学的崩溃。这种文化性格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某些性格恶性元素也或多或少地积淀在我们的思维结构中，我们如果不注意排除，往往就会重新表现出这种性格的某些方面。蔑视积极性思维，这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一种奇特的、病态的精神现象，很值得研究。但是，近年来却出现一种非常好的情况，这就是大批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正在改变这种文化性格，抛弃那种爆破式的所谓研究和评论，认真、踏实地进行积极性思维。他们已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正面的建设上，或者写文学史，或研究文学史上的某个片断、某个作家，或构筑一种理论系统，或运用一项新的方法去解释复杂的文学现象，他们都立足于建设，即使在研究中对许多已有的观念和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也表现出另一种积极的文化性格：（一）他们以积极的建设为目的，不是以爆破为目的；（二）他们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但这是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对传统的东西采取扬弃的态度，在传统与革新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而不是动不动就“彻底决裂”。近年来，一些中青年的理论工作者在探讨新的方法论中就表现出这种性格。有的同志担心，出现新的方法论，就会否认过去的文化成果，这是不必要的。

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我觉得，除了从破到立这个总趋向之外，还有四个趋向是很引人注目的：

（一）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